

幕
僚
史
(上)

第一章 探寻幕僚的出世渊源

一、从神圣到人本的转换

说古代中国是个“人治”社会；“人治”的历史悠久，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过“神治”的历史和“法治”的经历。只是“神”让位于人较早而“人”又迟迟不肯让位于“法”而已。不像欧洲至十六世纪，神还占着位子不让，最终还是让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一批启蒙思想家给拉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在公元前数个世纪就把神给撵下了神位。

现代人类学认为，人是由猿进化来的，因为老百姓分不清猿与猴子的区别，就学舌说人是猴子变的。不管俗说雅说，其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人的老祖宗不是人。人刚成为人，跟兽也差不了多少，必然是昏昏噩噩，只是为了生计，还没有能力和条件注意自身吃喝拉撒以外的事情，并试图找出它们与自己的关系。后来渐渐文明开化了，这一开化可不得了，问题就来了：他们就觉得风雨雷电，世事万物是多么奇妙，多么不可思议，多么深不可测。冥冥之中就造出一个“神”来吓唬或者安慰自己，神就这样诞生了。对“神”的行为予以解释，就产生

了原始宗教。夏朝人的原始宗教形态是什么样子，笔者遍查史籍也未能考究得出，但至商朝，神已经成长得像模像样了，商人虔诚地崇拜天帝，并以此为国教，天帝不但掌管风、雨、雷、电、雪、雹等天象，而且也主宰人间的征战、田猎、生产、建邑等事务。当然神是无形的，奉‘神命’而实行主宰的是商朝的统治者，信奉天帝的国神教是商朝统治者的最有力的统治支柱。商的统治者宣称自己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

但在商末，神的代言人纣王无道，搞得民愤臣怒。周人在西陲强盛之后，将‘代言人’的地位抢过来，从而创造了‘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天命转移论。说天帝选择有德的“民之主”来作为人间的代表，统治者的品行成为神选择代言人的依据，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的作为在社会统治中的决定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以周代商是“神”的地位式微的开始，也是“人本”思想的发端。

周朝既然是神按民意而建立起来的，当然应该重视民意了，认识到‘民众’在社会政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周人灭商的关键一战牧野之战是因为商的军队倒戈才得以迅速胜利，这给周的统治者一个极大的震动，认识到君权的裁决者是民众而不是天帝。这样，天神意志对君权来说便退为第二位的東西，民心向背、民众舆论成了第一位的东西。

春秋初年，进步政治思想家开始大规模讨论“民神关系”问题。提出了“民重于神”的观点。极有代表性的是季梁对随

侯的劝谏，他说祭神礼牲的意义在于表现民情政况，祭品的奉牲肥硕说明六畜兴旺；祭奉的粮食洁白晶莹，说明民和年丰，祭奉的酒甘美，说明上下都有德行，没有违背民意的地方；把神佑君权的立足点拉回到政治现实中来，主张鬼神佑否的关键是政绩如何，在于对民生的关注程度，施政措施如何，把国家兴亡、战争胜负的立足点拉到民心民情上来。

春秋后期“民”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进步政治思想家将民本思想更推进一步，认识到“民”在决定国家命运中的能动作用，这时的“民”即有了进攻性。提出了“民”有选择君主的权力，肯定了民反抗君主之命的合理性。《左传》载，晋军主帅智武子对献子说：“我实在是没有德能，需要与人结盟，我没有德能，人民就会抛弃我。……”可见，可见这时的“民”已获得独立的社会人格并具有了选择君主的主动权。卫献公荒淫无道，待臣下无礼，被大臣们赶走。晋蛋公认为卫臣子做得太过分，师旷则说是卫献公做得太过分，说君主应“养民”“容民”，若使民困贫，这样的君主有何用，把他赶跑是应当的。民不但可以选择君主，拥立贤君，而且可以主动赶走昏君，废掉庸主。师旷可以在公开场合向自己的君主讲述这样的道理，可见民本思想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纵观周初至春秋末期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民”与“神”逐渐易位的过程。周初“民”只是作为“神”考察君主德行而决定取舍的参照物。其后，民众力量在社

会生产和政治斗争中的主导作用逐步显示出来，被进步政治思想家所认知和重视；“民”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神”的地位逐步下降。到春秋末年，出现了重民不论神的倾向，“神”的位置完全被“民”所取代；成为决定社会政治前途的主导力量。

神不佑人，我必自佑。于是乎，知识分子适应人治的需要，挖空心思来研究治人的学问，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浪潮——治世论争。如果“民本”能够影响政治制度的变革，如果能够由“民本”发展到“民治”，由民治发展到“民主”，那么中国或许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了。无奈民神易位之后，“民本”的范围出现了个体化倾向，产生了“人本”思想，这就抹煞了“民本”的阶级属性；“人本”中的“人”是指广泛社会成员的“人”了。从而由此产生出“人学”，并由此派生出“人治”，从而也就注定了中国历史上绵绵不绝的“人祸”。

二、幕僚始祖的治世论争

既然“人本”这个大的方向已确定，但是在以人为本的治世方式上却有不同的看法，对这种看法的争论，就是治世论争，也就是先秦的百家争鸣。

先秦诸子百家，尽管争得不亦乐乎，可是没有一家不是以人本思想为核心的，也没有一家不重视对人的研究，通过治人而达到治世的目的；也没有一家不重视政治问题，百家之言，无不归宿于政治。道家主张无为，似乎是个自然主义派别，但

最终还是落脚于无为而治。他们都把兴邦治国、救世济民作为最高目标，因此他们的思想言论实际上都是治人方案。

生活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可能并不比以前以后的时代多出多少快乐和安逸，但那个时代的确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不难封爵拜相，谋取富贵。如果无意于功名利禄，也自可以著书立说，放言无忌，没有人会来管你的闲事。

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世界或许真的可以被他们改变。于是乎，儒家要回到西周，述仁讲礼，孔子带着弟子乘着牛车，风尘仆仆，栖栖遑遑；墨家要回到大禹，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同样风尘仆仆，奔走于列国，摩顶放踵；法家、纵横家更是一副急于将其学说发售脱手的样子，四处奔走，孳孳求利。

春秋战国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比奇妙的时期。生产在战车的呼啸中进步，文化也在刀光剑影的间歇中繁荣。历史在这里为各色奇人、异人、怪人及至圣人提供了一个空间和一段时间，于是人们创造了中国人历史上前世未能企及的后人又无从超越的绚烂文化。

1. 道德文化的发端

有一个强盗问他的头目盗跖：“当强盗也有道吗？”

强盗头目说：“当然有啊！天下什么事能离得了道呢？当强盗的学问大着呢。首先是‘妄意’——估计某处有多少财宝，值不值得动手，要计算得准确周到，——圣也。动手的时候，别

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要有勇于牺牲精神的，——勇也；得手之后，别人先撤退，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承担，——义也 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才能成功，这是需要智慧的，——智也；东西抢到以后，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仁义智勇圣，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为大盗的，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后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时候，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在他图谋篡位之前，礼贤下士，很会奉敬当时的知名学者如蔡邕等人。撰写《后汉书》的范曄在总结董卓篡权的历史教训时写道：“董卓这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衰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毁坏分裂了中央政权。像董卓这样开人胸膛、剁人手足，残酷得吃人不吐骨头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对于知名度高的文人学者，还懂得故意表演礼贤下士那一套，以便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侵袭篡夺东汉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很懂盗窃之道，很懂怎样去偷盗别人的东西。”

从董卓这类人对有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笼络利用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来做依据；坏人要想成功，也不能违反这些原则。可是天下到底是好人少；坏人多，所以好人用这些原则做好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利益少，坏人用这些原则做坏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灾祸就多了，

这就是仁义的反作用。

但不管是真仁义也好，假仁义也罢，仁义道德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有可不行，中国人就吃这一套。

●孔子‘七教’媚明主

孔子闲居，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做到了，才可以对外征伐。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

曾子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

孔子说：“‘七教’是指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结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操。”

孔子认为，七教是执政的根本原则。教育路线明确，根本路线才能走上正道。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划分土地给诸侯，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分别治理，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推荐贤德之人，辞退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能人就会高兴，不良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励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拔人才

——这七项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臣民如同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像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同寒暑一样灵验。所以君王能视远若近，并非是事物在近处，而是因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亲近，这就是明君防御可以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原因。

曾子又问：“什么是‘三至’呢？”

孔子说：“至礼而不谦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俸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因此说，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爱的情感团结全国人民的人；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最高的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人人奋勇向前。这就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铲除之，变更其政权，但对其

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家产。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像是及时雨，在哪里降落，无不受到欢迎。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

这就是儒家的治世治国之术。

●孟子‘仁学’惊惠王

魏文侯为战国时期的名君，是孔子名弟子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仁政的熏陶，将魏国治理成战国初期的一个文明强国。他的儿子魏武侯在文化成就上就远比不上父亲，武功却远在其父之上。梁惠王(即魏惠王)远不如他的父辈与祖辈，但在用庞涓之前，也曾有过赫赫战功，打败过韩、赵、宋，威胁鲁、卫、宋、郑等国来朝，并曾一度与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自从用庞涓为亲信大将后，对外用兵屡屡失败，丧权失地，长子被俘，因而就夹起尾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目的在于振兴魏国，再度称霸诸侯。

公孙鞅，卫国人，因在本国不得志，便来到魏国，做了魏国辅相公叔痤的门下士，有奇才。公叔痤临死前将公孙鞅推荐给梁惠王，建议将国政交公孙鞅执掌；倘若惠王不能重用公孙鞅，便结果其性命，千万莫使其出魏境。可是，梁惠王即不重用公孙鞅，也没有杀害他，因为他并不把公孙鞅视为奇才。后来公孙鞅投奔到秦国，帮助秦孝公变法强国。三年后，秦师兴兵攻打魏国，魏国不支，割河西之地求和，魏惠王被迫迁都大梁。公孙鞅因变法功大，秦孝公封他为商君，后来通称为商鞅，成

为历史有名的大改革家，他的变法革新，是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标志之一。

这时，孟轲在推行仁政主张屡遭失败之后决心去魏国碰运气。孟子认为魏国有尊崇儒家的传统，并且魏国新败急于恢复国力，这有利于魏君调整治国方略，而接受自己的主张，况且，梁惠王失去一个奇才卫鞅，才导致失败，这件事应当使梁惠王受到刺激，争于找到一个能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其父祖的辉煌业绩。

孟子来到魏国，大出所料的是梁惠王对孟子态度冷漠，若即若离，不郊迎，不宴请，不主动请教，孟子是通过关系才见到梁惠王，第一次见到就不十分愉快。

孟子是在魏国的朝廷上拜见梁惠王的，当时梁惠王正在与几个近臣议事。梁惠王见了孟子，上身微欠，算做以礼相待，既不问好，也不让座，像是集市交易似地，张口便问：“孟老夫子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是给我魏国送来了富国强兵之道，称雄天下之策，将助我谋利于天下吧！”说完环顾左右臣僚，嘻嘻笑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暴露出了梁惠王终不成器的风格。

孟子并不计较，他理解梁惠王的处境，根据当时所处的客观情势，梁惠王希望自己的邦国强大起来，甚至于最好是成就霸业，因而劈头问这么一句，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

孟子并非迂阔不懂现实，更不是学不会纵横捭阖的作风。

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进身之阶的作法和博取个人功名利禄的办法完全懂的，但他不肯那样做，因为他抱着古圣先贤济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从济世救民的宗旨出发。他希望从这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能够真正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国君，促使他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梁惠王是他选择的理想君主吗？看这情形，他深知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他的哲学思想和仁政主张。不过是对他抱着某些希望和幻想罢了，正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因为如此，孟子并不计较梁惠王的无礼。回答说：“安邦治国之道，仁义而已，大王何必张口就言利谋霸呢？”

梁惠王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孟子，但对孟子的政治主张和游说列国的情况却并不陌生，因而兴趣不浓。可是孟子毕竟是颇享盛名的学者、大儒，为了博得一个“尊贤”的美名，不得不故作热情，勉强倾听孟子讲那些仁政的道理。孟子的目光入骨三分，梁惠王的这些矫揉造作之举，哪里会瞒得过他。尽管如此，孟子也还是以诚相劝，说：“当今之世，上起诸侯国君，下至黎民百姓，无不苍蝇逐臭似地谋取一己之利，君王说：‘何以利吾国？’大夫说：‘何以利吾家？’士庶说：‘何以利吾身？’这样上下交相追逐私利，国家必然会危若累卵！试看天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那些拥有百乘、千乘的大夫们不能不说富有，然而却尽干这些悖逆的勾当，原因在于他们先利而后义。为人子者，不仁必遗其父

母,为人臣者,不义必慢其君上,成为窃国之大盗,大王这样重利轻义,岂不是自趋其祸吗?’

从孟子跟梁惠王这番谈话看,孟子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讲义,不言利。他怎会迂腐到闭眼不看现实和历史,否定利的价值呢?古往今来的文化体系无不言利。人类的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艺术……可是有哪一种能离开利呢?如不求利,又何必去学去做呢?然而孟子更清楚地看到,所有的混乱、争执、罪恶和痛苦,其实都是起源于人类毫无止境的好利之心,人们纠结于利益的漩涡之中。

惟有把好利之心转化掉,恢复人类本性中原有的仁义之心,使人们再度有了澄澈清明的心灵,这个世界才能恢复和谐的秩序。在孟子的思想里,真正值得关心的是生存权力的保障,是安居乐业的追求,是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义利之辨。

孟子第二次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正在御花园中散心,他站在一个大沼池的岸边仰望那树梢上栖息飞翔的鸿鸟、野雁,俯视草地上安详吃草的小鹿。他一边观赏园中美景,一边问孟子:“请问孟老夫子,仁人君子是否也喜欢观赏这园林风光,是否也喜欢这些珍禽异兽呢?”

这种问话和语气神态,明显的是说仁人君子也应当好园林珍禽这些物质利益。孟子态度严肃,用单刀直入教训的口吻回答梁惠王说:“仁人君子与贤者,待天下之民共享安乐后,才去享受此园林之乐;不贤之君,纵然有天下最美的园林,也不

会真享其乐，且难以长久。

接着孟子又引用《书经》的记载，当暴君夏桀在位的时候，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之于天下，犹若太阳，太阳何时消灭，我才何时死亡。”自夸其政权像太阳一样永恒，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恨透了他，说道：“你这如同烈日般的暴君啊，何时才能坠于西山呢？你赶快坠落吧，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也不愿再忍受暴政的残害！”最后孟子强调说：“为人君者，使百姓怨恨到愿与其一同灭亡的地步，纵然拥有美好的台池、鸟兽，又怎么能安享其乐呢？”

梁惠王对孟子的接触好像蜂蝶恋花，翩翩嗡嗡绕花飞转，既落花蕊，必吮其甘甜，二人每说一次话，梁惠王的态度就好转一次，待到第四次相见，已经变得虚心诚恳了，表示：“寡人愿洗耳恭听夫子的教诲！”

孟子避开梁惠王的请教，反问道：“用木棒杀人与用刀杀人有何不同？”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追问：“用刀杀人与用暴政杀人有什么不同。”

梁惠王犹豫了一下说：“当然亦无不同。”

孟子的话锋陡转，说道：“如今魏国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大王的厨房里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马厩里有膘肥体壮的骏马，而百姓却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濒于死亡的边缘，原野里饿殍横七竖八，令人毛骨悚然，这等于为君者在率领禽兽噬

人。野兽噬人,人尚且痛恨之,执政者率禽兽吃人,又怎么谈得上为民之父母呢?……”

为在冷酷竞争的现实中求得生存,梁惠王再次登门拜访,向孟子求教:“当初,魏国强大,天下诸国很少能与之匹敌,可是到了寡人手中,东败于齐国,我的儿子被俘 西败于秦国,强秦掠夺我河西之地七百里;南面受楚国的侮辱,襄陵一战,失去八座城地。这是寡人寝食难安的奇耻大辱,依夫子高见,寡人该如何行事?”

看来,梁惠王还是念念不忘国耻。孟子说:“只要施仁政于民,方圆百里的小国也能够王天下,更何况魏国是大国呢?减轻刑罚,减少税敛,使百姓不失农时深耕细耨,闲暇时间,以孝悌忠信之德教育青少年,使其入则奉事父兄,出则尊敬长辈和上级。倘能如此,哪怕是手持棍棒,也足以抵御秦国和楚国的坚甲利兵了。陛下请想想,那秦国和楚国实行霸道,无时不在征兵征役,夺取农民的劳动时间,人民不能够耕耨以养其父母,致使父母冻饿而死,兄弟妻子东逃西散,有谁还会再与大王的仁义之师相抵抗,正所谓‘仁者无敌于天下’!……”按一般纵横游说之士,见梁惠王提起国耻,定会投其所好,提出聚敛财富以加强军队建设,以对外战争来报仇雪耻。而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孟子,则一贯推行仁政。这说明了他行为与理论的一贯性。

●南面之术源戈子

道家崛起于战国前期。其时，天文观测取得了较大成就，海上交通开阔了人的眼界，故而道家利用这些科技新成果，试图将天人关系与人际关系打通一同来研究，以天道自然之规则比况社会人事之规律，因而提出了“法自然”“尚无为”；效天地万物自然生长、运转之规则来治理社会，创造了一种比墨家向后看得更远，以恢复到无争无知的原始群居生活为标志的社会理想。

道家由于了解古代历史，明晓各部族传说中的先史社会，故仰慕其自然之治，无为而化。因而作为自己学派的理想社会加以研究、发挥，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统治术，提倡统治者应“清虚以自守”；少扰民，用民，用“卑弱以自持”；像氏族首领那样以平等之心对待民人，故可取得万民支持，社会便不治而自清正。

道家从人性意义上去讨论社会政治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动乱，争夺的原因是人性中自然古朴的东西太少了，而人为的假饰东西太多了。儒墨仁人道德说教，破坏了人的自然天性，启发了人性中恶的东西产生。所以，应当废除一切道德律条，抛弃一切礼仪规范，舍除一切心智心计，而使民人恢复到无争斗、无欺诈的古朴状态中去，遵循自然之理去创造社会之“道”，使人性恢复自然天性，使人道合于自然天道。使社会治理合乎天地自然之道，是道家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这种反对人事人为的社会治理学说，是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全新